

# 多方调停效果的社会网络分析 (1945—2001)<sup>\*</sup>

陈 冲

**【内容提要】** 近年来,调停逐渐成为国际争端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冲突管理类型之一,大量学术研究都在探讨调停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地帮助争端方解决争端。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多个调停者对争端解决效果的影响,即意味着建立在单个调停者这一假定基础上的调停效果研究排除了第三方调停者之间互动的影响这一重要因素。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路径,分解了国际争端中由多个调停者组成的调停集团内部的互动联系。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的观点,争端方通过第三方形成的间接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双边联系(如贸易、外交)对国际调停进程的影响更重要,因为社会网络中的间接联系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而且,调停者之间通过间接联系(如朋友的敌人)形成的敌意与它们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的相似性对多方调停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利用1945—2001年的“战争相关争议议题”数据,使用统计方法检验了多方调停对国际争端结果的影响。统计结果支持了本文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提出的解释。

**【关键词】** 国际争端 多方调停 社会网络 调停效果 定量分析

---

\* 本文是刘丰博士主持的2012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美国海外军事干涉行为与国际秩序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2YJCGJW00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科学》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

《国际政治科学》2012/4(总第32期),第18—62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尽管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国际争端管理方式，调停（mediation）近年来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但大多数调停研究基本忽视了调停者的数量（或规模）对争端管理效果的影响。无论是关注调停发生的条件、调停使用的策略，还是调停的效果，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区分单方调停（single-party mediation）与多方调停（multi-party mediation）之间存在的差异，而是理所当然地设定二者对国际争端结果的影响具有相同逻辑和机制。然而，调停者都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决定是否参与调停的。在存在多个调停者管理国际争端的情况下，调停者之间利益和偏好的差异可能增加彼此之间的协调难度，从而使调停过程比单方调停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多方调停的复杂特征，那么极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误。另一方面，在国际调停实践中，多个调停者（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共同管理国际争端的案例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例如，根据伯恩·贝伯（Bernd Beber）的统计，在1990年至2005年之间，将近一半的国际冲突调停事实上都属于多方调停。<sup>①</sup>可以说，对多方调停这一议题的讨论将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调停这一争端管理方式。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多方调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争端的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采用雅各布·伯科维奇（Jacob Bercovitch）对调停的定义，将其界定为“一种与争端方本身的谈判相关但却明显不同的冲突管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争端方主动请求第三方（个人、组织或国家）的帮助或接受来自第三方提供的帮助，以此改变争端方的认知和行为而无须诉诸武力或法律权威解决”。<sup>②</sup>这一相对宽泛的定义包括了所有自愿的、非暴力的第三方干涉行为，但同时也排除了纯粹的第三方军事干涉行动以及争端方的双边谈判努力。而“多方调停”，顾名思义，是指两

---

<sup>①</sup> Bernd Beber, “The (Non-) Efficacy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Wars Since 1990,”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August 2010, available at [https://files.nyu.edu/bb89/public/files/Beber\\_MultipartyMediation.pdf](https://files.nyu.edu/bb89/public/files/Beber_MultipartyMediation.pdf), p. 2.

<sup>②</sup> Jacob Bercovitch, “Medi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Jacob Bercovitch,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Conflict Resolu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9), p. 343.

个或多个以上的第三方干涉者参与争端调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多方调停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多个调停者同时参与调停,但不存在协调彼此行动的努力;(2)多个调停者相继参与争端调停;(3)多个调停者形成“调停集团”(mediating coalition)参与调停。<sup>①</sup>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第三种形式的多方调停,即国家之间组成调停集团共同干预国际争端。

鉴于既有关于多方调停研究的文献基本上都属于案例研究,本文侧重于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以求获得更为一般化的研究结果。为此,本文利用了“战争相关争议议题”(Issue Correlates of War, ICOW)数据,使用统计方法系统检验了1945—2001年间国际争端中的多方调停行为。同时,在理论路径上,本文借鉴了国际关系学界新近兴起的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路径,提出了不同于既有研究的解释框架。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回顾既有关于多方调停效果的成果,总结并梳理了四种主要解释路径;第二部分阐述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提出的解释框架;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部分讨论统计分析结果;最后是结论部分。

## 一、多方调停效果的既有解释

目前学界已经有大量关于调停效果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很少区分单方调停和多方调停之间的差异。由于忽视了多方调停的特殊性,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多方调停的效果仍有待经验上的进一步检验。尽管既有研究很少明确区分单方调停与多方调停,但总体而言,可以归纳出四种可能的解释路径。第一种属于权力解释路径,强调多方调停的成败取决于调停者所拥有的总体权力和资源的多少,认为当多个调停者组成调停集团时,

---

<sup>①</sup> 关于多方调停定义的讨论可参考: Chester Crocker, et al., eds., *Herding Cats: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A Complex World*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p. 10; Tobias Böhmelt,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teraction: Synergy, Conflict, Effectiveness* (Wiesbaden, Germany: VS Verlag, 2011), p. 106; Tobias Böhmelt, “Why Many Cooks If They Can Spoil the Broth? The Determinants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9, No. 5, 2012, p. 702.

有助于积聚更多的权力，因而多方调停总体上比单方调停更有效；第二种路径突出了调停集团成员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认为多方调停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调停集团的组织成本而非其积聚的权力大小；第三种解释路径强调了多方调停者和争端方的身份属性与认同对调停效果的影响；第四种观点来源于“联系理论”（contact theory）的解释，着重关注调停者与争端方之间形成的“关系”（relationship），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性（或合作性）关系对调停效果具有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 （一）权力积聚效应的解释

权力积聚效应的解释对多方调停效果关注的着力点在于调停的供给方（即调停者），它强调了调停者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对调停效果的影响。<sup>①</sup>这一观点认为，相比于单个调停者而言，多个调停者组成的调停集团将增加调停供给方提供干涉的能力，多方调停比单方调停总体上更有效。根据这种解释，由于调停者之间可以分享情报信息和后勤设施，可以积聚力量，分担调停的成本，因而有利于调停的成功。鉴于既有研究大多支持大国参与的调停比小国参与的调停更容易成功这一观点，在多方调停中，基于调停者的权力积聚效应的解释路径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这种解释沿袭了既有关于调停效果的研究中对调停者权力的关注。一般认为，调停者本身的实力是决定其调停是否有效的关键：一方面，实力决定了调停者参与冲突管理的资源分配能力，实力强大的国家拥有较高的信息搜集能力，可以综合利用“胡萝卜加大棒”策略说服或迫使争端方接受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充当调停协议的有力监督者等；另一方面，实力强大的调停者对争端方的影响较大，由于害怕损害同该大国（或强国）的关系，争端方在接受大国调停的意愿上比其他小国提供的调停更强烈，从而更容易促使调停成功。正如威廉·扎特曼（I. William Zartman）和萨迪亚·图

---

<sup>①</sup> Crocker, et al., “Multiparty Mediation and the Conflict Cycle”, in Crocker, et al., eds., *Herding Cats: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a Complex World*, pp. 20 – 22.

瓦尔 (Saadia Touval) 所言,“权力是通往调停的门票……调停者被争端方所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中立的,而是因为它们拥有产生自己乐于接受的结果的能力,只有当第三方调停有可能达成协议或者帮助争端方解决困境时,它们才会被接受为调停者,而这通常需要权力”。<sup>①</sup> 在权力聚集效应解释路径看来,多方调停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将单个国家的权力汇聚在一起的渠道,因此可以促进调停的成功。例如,切斯特·克罗克 (Chester Crocker) 和芬·汉普森 (Fen Osler Hampson) 等认为,一个由大国组成的调停集团在原则上能够比单个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sup>②</sup> 权力解释路径认为,第三方调停者的功能就是将一些与权力、经济和信息等相关的资源带入到冲突管理中,帮助争端方达成解决协议。<sup>③</sup> 很明显,这种路径认为,调停者的数量越多,作为集团的整体可以集中的信息就越全面,可以分配的资源也越多,这样就越有助于调停的成功。托拜厄斯·博梅尔特 (Tobias Böhmelt) 在研究多方调停发生的条件时发现,调停者的实力确实会显著地影响争端方接受调停的意愿,进而影响调停的效果。<sup>④</sup>

不过,权力积聚效应的解释路径遭到了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挑战。在现实层面,尽管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在国际冲突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是越来越多的“弱调停者”(weak mediator)开始参与国际争端管理。<sup>⑤</sup> 它们缺乏传统意义上大国所拥有的权力,但却广泛参与国际争端的调停。例如,挪威缺乏常规大国拥有的调停资源和权力,但挪威却积极参与了斯里兰卡内战的调停。除此之外,更为“弱小”的行为体,如国际组织甚至包括“个人”,在冷战结束之后也广泛参与到国际

---

① I. William Zartman and Saadia Touval,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ower Politic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41, No. 2, 1985, p. 27, 40.

② Crocker, et al., “Multiparty Mediation and the Conflict Cycle,” p. 22.

③ Kyle Beardsley, “Intervention Without Leverage: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Weak Medi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5, No. 3, 2009, pp. 272 – 297.

④ Böhmelt, “Why Many Cooks If They Can Spoil the Broth? The Determinants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p. 701 – 715.

⑤ Beardsley, “Intervention without Leverage: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Weak Mediation,” p. 273.

冲突调停中。因此,从国际关系的现实层面分析,单纯的权力解释路径不仅无法解释缺乏资源和权力的“弱小”行为体调停成功的现象,而且也不能完全解释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的多方调停为何失败这一问题。在理论上,这一解释路径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多方调停者利益一致并愿意合作这一假定上,不过这一假定遭到了集体行动理论的强烈挑战。它认为国家组成调停集团虽然可以聚集更多的权力,但它并不必然增加集团行动的效率。<sup>①</sup>

## (二) 集体行动理论的解释

源于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关注调停集团提供公共物品(就本文研究主题而言,即全球或地区和平)的组织成本对调停效果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调停集团的规模增加,并不一定会增加调停成功的可能性,反而有可能导致调停的失败。调停集团的组织成本随着集团成员规模的增加而上升:一方面是由于参与冲突调停的国家数量越多,就意味着该调停集团成员之间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越高,从而增加了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协调难度;另一方面,随着调停集团规模的扩大,一些国家“搭便车”的意愿可能会增加,即使对争端调停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它们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调停带来的收益。<sup>②</sup> 尽管通过更多的监督或者制裁措施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坐享其成”,但是监督或制裁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同样会随着调停者数量的增加而加大。<sup>③</sup> 这种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对于潜在调停者提供调停的意愿会产生影响,而且也影响

---

<sup>①</sup> 参考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锋、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sup>②</sup> Böhmelt, “Disaggregating Mediations: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1, No. 4, 2011, p. 866.

<sup>③</sup> James D. Fearon, “Bargaining,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2, 1998, p. 270; Emilie M. Hafner-Burton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Power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ocial Networks,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0, No. 1, 2006, p. 10.

到调停集团成员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因此,多方调停集团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的偏好和动机很可能成为争端解决的障碍,更何况对国际冲突调停的提供也存在“搭便车”的可能。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当存在多个潜在调停者时,由于提供调停的第三方国家数量较多,“搭便车”的意愿导致调停发生的可能性反而减低。<sup>①</sup>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博梅尔特发现,尽管调停集团的权力随着集团规模的增加而增强,但同时也增加了集团的组织成本,导致了调停规模和调停效果之间呈现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调停集团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不如中等规模的调停集团效果显著,他进一步发现理想中的调停集团规模应该是三个国家。<sup>②</sup>

尽管集体行动理论对多方调停效果提出了一种比较有力的解释,但是它忽视了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集体行动理论所认为的“搭便车”仅是对多方调停效率低下这一现象的描述,忽视了与这一现象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争端产生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对调停者意愿的影响程度。凯尔·比尔兹利(Kyle Beardsley)的研究表明,对潜在调停者而言,其是否提供调停直接与国际危机产生的负外部性的程度有关。负外部性对潜在第三方的影响越大,那么其提供调停的意愿就会越强烈,进而导致其“搭便车”的意愿下降。<sup>③</sup>因此,在多方调停中,决定是否在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争端本身的负外部性。第二,在调停集团中,由于负责组织国家形成调停集团的主要调停者(primary mediator)常常具有相对较高的威望和更多的联系,其在协调其他成员的行动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影响其他成员采取一种“追随”

---

① 参考 Kyle Beardsley, "Pain Pressure and Political Cover: Explaining Mediation Inc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0, pp. 395-406; 陈冲、卢璟《国际危机调停的供需因素(1918—2001)》,《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2期,第1—39页。

② Böhmelt, "Disaggregating Mediations: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p. 865-866.

③ Kyle Beardsley, *Politics by Means Other than Wa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h. D. dissertation,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chapter 3; Kyle Beardsley and J. Michael Greig, "Disaggregating the Incentives of Conflict Management: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5, No. 3, 2009, pp. 243-248.

(bandwagon) 策略, 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组织成本。<sup>①</sup> 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明显忽视了这类调停者的影响。第三, 在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调停集团中, 集团规模与异质性并不存在一种线性关系。换言之, 集团的异质性密度 (density) 并不一定因为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呈现相应地增加。在第三方调停者组成的国家调停集团中, 随着调停者数量的增加, 集团成员之间的利益会向“两极”集中,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它们在调停中各自采取制衡 (balancing) 和追随两种方式。<sup>②</sup> 根据泽夫·毛兹 (Zeev Maoz) 的研究, 在这种“极化” (polarization) 的调停集团结构下, 调停集团的异质性反而可能低于规模较小的调停集团网络。<sup>③</sup> 在此意义上, 调停者的规模与组织成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

### (三) 规范、身份和认同的作用

这一解释源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阵营的学者对调停集团成员的规范、身份和认同的关注。切斯特·克罗克和芬·汉普森等认为, 多方调停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调停集团中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拥有相似的目标, 愿意一同工作。<sup>④</sup> 如果调停集团的成员在目标和利益上具有较大的分歧, 那么多方调停不仅不容易发生, 更不容易取得成功。调停的供需方本身的“政体类型” (regime type)、文化、宗教等社会心理因素都会影响到它们之间合作性关系的建构。例如, 有观点认为, 调停者的“政体类型” (即所谓的“民主”或“非民主”国家) 这一身份特征界定了其行为模式。博梅尔特根据“民主和平论”的观点, 检验了调停集团成员的“政体类型”的相似性对多方调停效果的影响。他认为, 民主国家之间拥

① Aysegul Aydin and Patrick M. Regan, “Networks of Third-Party Interven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3, 2012, pp. 573–597.

② 参考艾瑟格·艾丁 (Aysegul Aydin) 和帕特里克·里根 (Patrick M. Regan) 的研究, Aydin and Regan, “Networks of Third-Party Interven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③ Zeev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5–200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82.

④ Crocker, et al, “Multiparty Mediation and the Conflict Cycle,” p. 22.

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因而增加了它们政治的透明程度和对相同规范的认同。这种相似的规范促进了国家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使得调停者之间的合作更容易实现，因此调停集团的民主化水平越高，多方调停就越容易成功。不过，博梅尔特的这一假设并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sup>①</sup> 艾瑟格·艾丁 (Aysegul Aydin) 和帕特里克·里根 (Patrick M. Regan) 进一步讨论了第三方干涉者之间的利益相似性 (similarity of interest) 对内战持续时间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第三方干预者拥有相似利益偏好将缩短内战的持续时间，而拥有不同利益偏好将延长内战的持续时间。<sup>②</sup> 尽管没有直接关注多方调停效果，但是布洛克·雷 (Block Jr. Ray) 和戴维·西格尔 (David A. Siegel) 从社会认同的视角发现，如果调停者在语言和宗教上具有相似的认同，那么调停更有可能成功。<sup>③</sup> 里那图·康尔贝塔 (Renato Corbetta) 同样发现，在多个第三方干预者的联合行动中，干预者之间利益的“同质性” (homogeneity) 网络联系将决定第三方干预的意愿。他根据政体得分计算出干涉网络的同质性密度，并发现当第三方与冲突方之间的同质性越大时，第三方干预最有可能发生，也更容易成功。<sup>④</sup> 不过，里那图·康尔贝塔的研究重点探讨的是调停的供需双方之间的同质性问题，而非调停集团本身的内同质性。而莫丽·英曼 (Molly Inman) 等探讨了调停的供需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对调停者关于冲突双方偏见 (bias) 的影响，他们发现调停者如果与其中一个争端方的文化差异较小，那么调停者就会对另一方存在较大的偏见，这种差异进而会显著地影响

---

① Böhmelt, “Disaggregating Mediations: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 869.

② Aysegul and Regan, “Networks of Third-Party Interven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pp. 573 – 597.

③ Block Jr. Ray and David A. Siegel, “The Impact of Social Identity on Third-Party Mediation,” paper deliver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yatt Regency Chicago and the Sheraton Chicago Hotel and Towers, Chicago, IL, August 30, 2007; Block Jr. Ray and David A. Siegel, “Identity, Bargaining, and Third-Party Mediation,”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3, No. 3, 2011, pp. 416 – 449.

④ Renato Corbetta, “Determinants of Third Parties’ Intervention and Alignment Choices in Ongoing Conflict, 1946 – 2001,”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6, No. 1, 2010, pp. 61 – 85.

调停的效果。<sup>①</sup>

从调停集团的身份和利益属性视角解释多方调停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调停集团成员的社会认知因素的作用，因此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路。然而，既有关于集团身份或认同异质性的研究存在变量操作化过于简单或是缺失数据太多等问题。例如，尽管博梅尔特探讨了调停集团的民主化水平这一属性对多方调停效果的影响，但是他在计算集团民主化水平时，却采取了简单的累加方式，即将各个成员的民主得分简单相加，再求平均值得出调停集团的民主化水平。这一方法存在严重的信息遗漏可能性，特别是忽视了调停集团中更有权力的成员对调停模式的影响。<sup>②</sup> 事实表明，在调停集团中，最有权力的成员通常在决定调停的策略上影响更大。同时，这种解释模式过分强调了第三方形成调停集团是出于共同的身份、利益这一假定，从而忽视了国家之间组成调停集团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出于共同的目标和利益的考虑的事实。

#### （四）调停集团成员与争端方的关系

第四种解释强调多方调停者与争端方之间形成的关系属性，这种关系属性一方面关注调停者与争端方之间存在的各种“联系”（ties），另一方面关注调停集团成员对争端方持有的不同“偏见”。<sup>③</sup> 第三方调停者与争端方之间的联系越多，调停者对争端各方的意图、实力、决心等的认识就越明确；同时，争端方对调停者的实力、偏好、利益和可信性（credibility）的认识也会越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争端方即使最初不愿意接受调停，也

---

<sup>①</sup> Molly Inman, et al., “Cultur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Mediation of Interstate Crises,” paper delive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Montreal, Quebec, Canada, March 16 - 19, 2011.

<sup>②</sup> Böhmelt, “Disaggregating Mediations: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 872. 在笔者与博梅尔特的邮件交流中，他指出在文章的匿名评审时自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使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代替“政体 IV”（Polity IV）数据的累加方式，但由于缺失数据太多，并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的效果。

<sup>③</sup> 参考 Molly M. Melin, “The Impact of State Relationships on If, When, and How Conflict Management Occu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3, 2011, pp. 691 - 715.

很有可能被“柔化”(softening up),从而使得争端容易通过外交途径(如谈判和调停)加以解决。<sup>①</sup>在这种“联系理论”<sup>②</sup>的解释框架下,调停研究集中关注调停者与争端方的经济<sup>③</sup>、同盟、历史关系<sup>④</sup>和国际组织网络中的联系。<sup>⑤</sup>它们之间通过这些联系,形成不同的互动关系——既有合作性的,也有冲突性的——并因此直接对调停集团的调停效果产生影响。在这方面,博梅尔特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开创意义。他检验了调停集团成员之间的军事冲突这类冲突性关系以及成员之间共同加入的国际组织这类合作性关系对于多方调停效果的影响,并进一步表明国家之间合作性的关系有助于争端调停的成功,而冲突性的关系会削弱多方调停的效果。<sup>⑥</sup>不过,博梅尔特的研究仅仅考察了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联系,对于其他联系是否对多方调停效果有影响仍然有待检验,而且他仅仅测量了调停者是否存在双边的(直接)友好或敌对经历,而没有考虑到即使它们不存在直接联系时其存在的间接敌对或友好关系也可能影响到合作的效率。例如,尽管两个调停者本身在历史上没有冲突的经历(博梅

---

① J. Michael Greig and Paul F. Diehl, “Softening Up: Making Conflicts More Amenable to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2, No. 4, 2006, pp. 355 – 384.

② 关于联系理论的论述可参考 Ifat Maoz, “Evaluat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Groups in Dispute: Equality in Contact Interventions between Jews and Arabs in Israel,” *Negotiation Journal*, Vol. 21, No. 1, 2005, pp. 131 – 146; Greig and Diehl, “Softening Up: Making Conflicts More Amenable to Diplomacy,” pp. 355 – 384.

③ Tobias Böhmelt,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4, 2010, pp. 566 – 592;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Trade Networks and the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paper delivered to for the 10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MA, August 28 – 31, 2008.

④ J. Michael Greig and Patrick M. Regan, “When Do They Say Yes? An Analysis of the Willingness to Offer and Accept Mediation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4, 2008, pp. 759 – 781.

⑤ Tobias Böhmelt,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Importance of Indirect Ti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Vol. 35, No. 3, 2009, pp. 298 – 319;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A Network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2, 2008, pp. 189 – 212; Mark J. C. Crescenzi, et al., “A Supply Side Theory of Medi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4, 2011, pp. 1069 – 1094.

⑥ Böhmelt, “Disaggregating Mediations: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 873.

尔特的测量方式), 但其中一方正好与另一方的盟国交恶, 那么它们的关系很可能出现敌对状态。<sup>①</sup>这也是社会网络分析对直接联系测量的批评之处。

多方调停者与争端方关系这一路径的另一个层面关注调停者的偏好对调停效果的影响。尽管在调停效果研究中, 对于存有偏见的调停者是否可以有效管理冲突这一问题本身还存在争议,<sup>②</sup>但是在多个调停者有助于克服单方调停者对其中一方的偏袒而造成的调停公正性缺失这一问题上却存在基本一致的共识。从争端方角度看, 如果争端方认为其中一方偏袒自己的对手而产生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它就可以请求另外一个调停者参与到调停集团中, 从而平衡前一个调停者的偏见对自己的影响。例如, 在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冲突中, 以色列常常请求美国调停, 而巴解组织害怕美国过分偏袒以色列的利益, 因而请求苏联参与共同调停, 因而出现了美国和苏联组成调停集团发起 1991 年的马德里和会的情况。<sup>③</sup>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调停集团中会出现美苏两个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参与调停的情况, 更说明了调停集团中的成员在利益偏好上并不必然一致。由于调停集团中的成员在偏好上可能存在差异, 调停者有可能分别选择偏袒不同的一方, 因此导致这种集体行动出现协调上的困难, 从而影响调停的效果。尽管里那图·康尔贝塔的研究只探讨了调停者选择与冲突一方结盟对其

① 这种间接关系对国际关系结果影响的代表性研究可参考 Zeev Maoz, et al., "What Is the Enemy of My Enem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6 - 2001,"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1, 2007, pp. 100 - 115。

② 相关争论可参考 Andrew H. Kydd, "Which Side Are You On? Bias, Credibility, and Medi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4, 2003, pp. 597 - 611; Andrew H. Kydd, "When Can Mediators Build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3, 2006, pp. 449 - 462; Burcu Savun, "Information, Bias, and Mediation Succ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1, 2008, pp. 25 - 47; Holger Schmidt, "Biased for Peace? Commitment Problems, Impartiali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rd-Party Guarantees," paper delivered to for the 2003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PA, August 28 - 31, 2003; Isak Svensson, "Bargaining, Bias and Peace Brokers: How Rebels Commit to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2, 2007, pp. 177 - 194。

③ Böhmelt, "Disaggregating Mediations: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p. 875 - 876。

干涉意愿的影响,<sup>①</sup> 但从他的研究中可以推断调停集团选择偏袒不同的冲突方将影响集团调停的效力。而伊萨克·斯文森 (Isak Svensson) 的研究表明, 在国内冲突中, 偏向政府一方的调停者可以减少政府的忧虑, 从而消除反叛一方的“承诺问题” (commitment problem),<sup>②</sup> 进而有助于谈判的成功。<sup>③</sup> 不过, 博梅尔特在研究调停者的偏见对多方调停产生的影响时, 发现在多方谈判中对偏见的“抵消” (counterbalancing) 并没有发生。不过, 对于这一违反常规思维的发现, 他并没有给予过多解释。<sup>④</sup> 然而, 这一解释路径在方法上还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 即“选择偏见” (selection bias)。<sup>⑤</sup> 因为在调停效果研究中, 研究者对这些关系数据的搜集和观测事实上仅限于已经发生的调停中调停者与争端方之间的关系, 而大量的缺失数据会因为没有经历多方调停而产生。这将显著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 甚至产生有偏误的结果。因此, 一种较好的弥补方式是将所有潜在第三方关系都考虑进来, 而这正是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比较容易实现的。<sup>⑥</sup>

除以上四种主要的解释模式之外, 既有关于多方调停效果的研究也探讨了一系列争端本身的特征对于解决国际争端的效果的影响。例如, 争端

---

① 参考 Corbetta, “Determinants of Third Parties’ Intervention and Alignment Choices in Ongoing Conflict, 1946 – 2001,” pp. 61 – 85。

②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1995, pp. 379 – 414。

③ Isak Svensson, “Bargaining, Bias and Peace Brokers: How Rebels Commit to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2, 2007, pp. 177 – 194。

④ Böhmelt, “Why Many Cooks If They Can Spoil the Broth? The Determinants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p. 701 – 715。

⑤ 对“选择偏见”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考: William Reed, “Selection Effects and World Politic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1, 2002, pp. 1 – 4; James Fearon, “Selection Effects and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1, 2002, pp. 5 – 30; Curtis Signorino, “Strategy and Sele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1, 2002, pp. 93 – 115; Molly M. Melin, et al., “It Takes Two to Fight but Three to Mediate: Analyzing the Occurrence of Third Party Conflict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2009, p. 6。

⑥ 参考 Böhmelt,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teraction: Synergy, Conflict, Effectiveness*, chapter 3。

的烈度、争端的持续时间、争端的负外部性、争端方之间的实力对比等等。<sup>①</sup> 这些因素在既有的调停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由于学界对多方调停效果的统计研究仍然较少，它们对多方调停效果的影响是否与单个调停者的情况一致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通过上面的文献梳理，本文考察了四种关于多方调停对国际争端结果影响的解释路径。本文发现，既有研究对多方调停的关注大体上仍然采取了与单方调停研究相似的逻辑，对于多方调停的特征和调停集团之间的互动仍然关注不多。同时，由于对调停效果的关注没有考虑调停案例的“选择效应” (selection effect)，既有研究对于多方调停的效果是否优于单方调停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一致的答案。例如，在伯恩·贝伯的研究中，他着重关注了多方调停研究的选择偏见对冲突结果的影响。他通过分析1990年之后不同时间段的冲突调停发现，当控制多方调停者与冲突方的“内生性关系” (endogenous relationship) 之后，额外增加的调停者并没有显著地增加调停成功的可能性，他的研究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多方调停效果研究中的这一“选择偏见”影响。<sup>②</sup> 对于既有研究存在的解释不足，本文将采用国际关系中新近兴起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加以弥补。这一方法将多方调停者组成的调停集团视为一个“调停者网络” (network of mediators)，通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特有分析工具，可以更准确地测量调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网络结构和属性是如何影响多方调停效果的。

## 二、多方调停效果的网络分析理论

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始广泛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提供了一套分析调停相关各方联系和互动的的方法论工具，而且也提

---

<sup>①</sup> 关于这些因素对调停效果影响的评论可参考陈冲《国际冲突调停的理论与方法争鸣——评〈调停国际危机〉、〈国际冲突调停〉与〈国际调停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144—146页；陈冲、卢璟《国际危机调停的供需因素（1918—2001）》，第10—15页。

<sup>②</sup> Beber, “The (Non-) Efficacy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Wars Since 1990,” p. 7.

供了一种重新理解调停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sup>①</sup>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理论, 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通过一定的联系形成了特定的国际网络, 行为体 (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 就是网络中的“点” (node), “联系” (tie) 界定它们之间互动的“规则” (rule)。国际网络包括不同的形式, 既有合作网络 (如安全同盟、贸易网络、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国际组织网络、外交关系以及文化网络等), 也有冲突网络。这些网络涵盖了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维度, 行为体在这些不同的维度上互动。作为一种结构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突破了传统的属性研究路径 (即行为体的特征), 而着眼于行为体间的位置 (position) 及关系。<sup>②</sup> 在国际关系中, 共同的国际组织成员、贸易关系、同盟关系以及其他联系都可以被视为国家之间的网络联系。这些联系能帮助促进有关行为体意图和利益的信息传递。那些较短的、密集的联系在传递信息时, 成本将更低, 也更精确和迅速, 这反过来会减少国家之间的不确定性, 增加成功合作的可能性。

社会网络分析关注的是行为之间的关系, 米歇尔·希尼 (Michael T. Heaney) 和斯科特·麦克勒格 (Scott D. McClurg) 认为, 社会网络分析特别适合研究以下问题: (1) 信息流动; (2) 协调、合作或信任; (3) 非正式组织; (4) 不同层次上的组织等。<sup>③</sup> 从前文对国际争端中多方调停的定义可知, 多方调停效果研究的实质就是探讨多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影响其结果, 可以说多方调停这一复杂过程涵盖了上述四大问题, 因此社

---

<sup>①</sup> 毛兹认为, 社会网络分析与理性选择 (rational choice) 路径一样, 既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路径, 同时也是方法论工具, 参考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5 - 2001*, p. 13。

<sup>②</sup> Stacie E. Goddard, “Brokering Change: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2, 2009, p. 254.

<sup>③</sup> Michael T. Heaney and Scott D. McClurg, “Social Networks and American Politic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7, No. 5, 2009, pp. 729 - 730。毛兹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网络分析如何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 Zeev Maoz, “How Network Analysis Can Inform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9, No. 3, 2012, pp. 247 - 256。

会网络分析完全适合多方调停这一研究议题。<sup>①</sup>在此意义上,多个国家之间形成调停集团并参与争端管理,在调停者之间以及调停者与争端方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网络,这一网络属于“隶属网络”(Affiliation networks) [也称为双模网络(two-mode networks)]。<sup>②</sup>在这一网络中,调停国家和争端方构成了这一社会网络中的“点”,争端调停者和争端方对调停的共同预期这一事件构成了定义这一网络的规则。

社会网络分析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多方调停效果提出不同于既有研究视角的解释。首先,不同于传统研究只关注争端方之间的直接联系(direct link)——双边贸易、外交关系等,社会网络分析强调了争端方在社会网络中拥有的间接联系(indirect link),即通过第三方行为体连接彼此的联系。这种间接联系的存在,将补充既有的直接联系(或在直接联系缺失时作为其替代)的信息传递功能,使得争端方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有效。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和埃及几乎没有直接的外交和贸易等联系,但是它们在西奈半岛的争端却经历了多次调停努力,原因就在于它们都与美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间接联系使得美国对埃及和以色列的诉求有着比较准确的理解,美国抓住了这点从而促成了《戴维营协议》。相反,如果使用传统的直接联系测量方法,将忽视埃及调停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与此同时,间接联系在一个网络中扩展了潜在调停者的数量。冲突双方与第三方之间的多种联系能够吸引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调停,因为这增加了潜在调停者的数量。密集的间接联系可能增加潜在调停者的动机,因为这些联系使第三方更容易意识到冲突的潜在负外部性。集体行动理论对多方调停效果解释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争端的负外部性的低估和忽视,而社会网络分析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社会网络关注到了行为体之间存

<sup>①</sup> Renato Corbetta and Keith A. Grant, “Intervention in Conflict from A Network Perspectiv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9, No. 3, 2012, pp. 314 - 340.

<sup>②</sup> 隶属网络常常以一个事件(event)、组织(organization)或群体(group)作为定义规则,与此相对的是“关系网络”(relational networks) [也称单模网络(one-mode networks)],定义这一类型网络的规则描述了任意两个点之间存在或缺失、有向或无向以及重要程度的关系。参考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5 - 2001*, p. 7.

在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 突出了网络具有的“外溢效应” ( spilling over)。<sup>①</sup> 在争端方与调停者形成的国际网络中, 争端的负外部性通过网络联系“外溢”到潜在的第三方调停者, 进而影响其参与调停的意愿。负外部性越大, 本身利益受到损害的程度也越大, 因此参与调停的意愿越强烈。在此意义上, 负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搭便车”现象。如果争端双方拥有的间接联系越多, 那么不仅意味着争端方之间的信息传递可以得到保障, 也意味着受冲突负外部性影响的调停者的意愿会增加, 从而有可能减少“搭便车”的意愿, 促成调停的成功。<sup>②</sup> 鉴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在国际网络中, 争端方通过第三方形成的间接联系越多, 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假设 2: 在国际网络中, 争端方通过第三方传递的信息越多, 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其次, 不同于传统研究对调停者互动关注主要集中在双边层次关系上, 社会网络强调了调停者在网络中不同位置对其行为的影响。在社会网络中, 调停者之间存在不同形式的联系, 拥有不同的利益和偏好, 从而在网络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根据位置的相似性可以将调停者网络分割成不同的“内生性组群” ( endogenous group), 同一个组群内的成员不仅拥有相似的网络结构, 而且也拥有相似的偏好。<sup>③</sup> 常见的“内生性组群”主要有聚类 ( clique) 和集团 ( block) 两类。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理论, 这种网络

---

<sup>①</sup> 参考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5 - 2001*, chapter 6.

<sup>②</sup> 参考 Beardsley, “Pain, Pressure and Political Cover: Explaining Mediation Incidence,” pp. 1 - 12; Böhmelt,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Importance of Indirect Ties,” pp. 298 - 319.

<sup>③</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5 - 2001*, p. 62.

位置的差异导致同一个集团内调停者之间的合作更容易，而不同集团的调停者之间更容易呈现冲突性关系。例如，埃米莉·哈夫纳-伯顿 (Emilie M. Hafner-Burton) 和亚历山大·蒙哥马利 (Alexander H. Montgomery) 发现，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中的成员如果属于同一聚类 (或集团)，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显著地减少。<sup>①</sup> 汉·多纳森 (Han Dorussen) 和休·沃德 (Hugh Ward) 进一步发现，在结构位置相似的集团中，信息的流动更迅速和准确，因而有助于冲突的和平解决。<sup>②</sup> 因此，在调停集团中，调停者之间的互动并不只是受到其直接关系的影响——这是博梅尔特的主要研究发现——而且也受到其所处的结构位置的制约。现实主义强调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friend)，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the friend of my friend is friend)， “敌人的朋友是敌人” (the friend of my enemy is enemy)， “朋友的敌人是敌人” (the enemy of my friend is enemy) 等观念就是这种结构位置的具体体现，毛兹称之为“不平衡关系” (imbalanced relations)。<sup>③</sup> 例如，即使调停者之间在过去并不存在直接冲突经历，但其中一方恰好是其盟友的敌人，那么这种“朋友的敌人是敌人”认知很可能会影响双方的互动，从而影响多方调停的效果。因此，如果多方调停者之间也根据这种结构位置的相似性来决定与其他调停者合作的程度，那么可以预期调停集团的行动效率将受到影响。具体来说，即使两个调停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敌对关系，但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其盟友的敌人，那么它们也很有可能对彼此显示出敌意，而不愿精诚合作。这样多方调停就不容易成功。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① Hafner-Burton and Montgomery, “Power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ocial Networks, and Conflict,” pp. 3–27; Matts Hammarstrom and Birger Heldt,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Testing a Network Position Approach,”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4, 2002, pp. 355–377.

② Dorussen and War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A Network Perspective,” p. 193.

③ Maoz, et al., “What Is the Enemy of My Enem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6–2001,” pp. 100–115.

假设3: 在国际网络中, 调停国家的结构位置越相似, 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假设4: 在国际网络中, 调停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越少, 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再次, 社会网络分析强调的另一个结构特征是网络的同质性 (或异质性)。在社会网络中, 同质性越高的行为体之间, “面对面交往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位置相距悬殊的行为体”。<sup>①</sup> 根据里那图·康尔贝塔的研究, 第三方干涉的效果与干涉网络的同质性具有显著性的关系, 同质性越高, 干涉越容易成功。<sup>②</sup> 而艾瑟格·艾丁和帕特里克·里根发现, 第三方干涉网络的异质性越大, 内战持续的时间就越长。<sup>③</sup> 可见, 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对于网络集体行动的效果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鉴于此, 本文同样关注调停集团网络的同质性程度, 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 调停网络的同质性越高, 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尽管社会网络为行为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提供了渠道, 但是, 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停者与争端方之间的“联系”是否存在偏见。但是如果调停集团中的成员明显偏向争端方 A, 那么争端方 B 就很有可能寻求另一方的帮助, 以求平衡对争端方 A 的偏见。艾瑟格·艾丁和帕特里克·里根以争端方的实力作为参照, 认为第三方

---

① 彼特·布劳 《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9 页。

② Corbetta, “Social Network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 - 33; Corbetta, “Determinants of Third Parties’ Intervention and Alignment Choices in Ongoing Conflict, 1946 - 2001,” pp. 61 - 85.

③ 参考 Aydin and Regan, “Networks of Third-Party Interven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pp. 573 - 597.

的偏见主要体现为“制衡”和“追随”两种行为。<sup>①</sup> 调停集团中的成员，既有可能采取制衡争端中实力强大的一方，也可以“追随”实力强大的一方。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影响干涉的效果。鉴于此，本文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在国际争端中，调停者对实力强大一方的偏见越大，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最后，鉴于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多方调停相比于单方调停是否可以成功解决争端，结合前文的文献分析，本文同时提出如下补充假设：

假设7：在国际争端中，多方调停比单方调停更容易成功。

假设8：在国际争端中，调停集团的规模越大，权力越大，调停越容易成功。

假设9：在国际争端中，争端方之间的直接联系越多，调停越容易成功。

接下来，本文将详细讨论如何检验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提出的解释多方调停效果的不同假设。

### 三、研究设计：数据、变量和模型

#### （一）数据来源

目前学界广泛使用的国际争端调停的数据主要有四种 “国际危机行

---

<sup>①</sup> 参考 Corbetta, “Determinants of Third Parties’ Intervention and Alignment Choices in Ongoing Conflict, 1946–2001,” pp. 61–85; Aydin and Regan, “Networks of Third-Party Interven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pp. 573–597。

为”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ICB) 数据、“国际冲突管理”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ICM) 数据、“第三方与国内冲突干预” (TPIID-Intrastate Dispute) 数据以及“战争相关争议议题” (ICOW) 数据。<sup>①</sup> 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争端管理行为, 因此本文主要使用 ICOW 中关于西半球和西欧的领土、海洋和河流权利主张争端以及中东地区的河流权利主张争端数据。<sup>②</sup> 由于目前数据搜集的限制, 本文的时间跨度涵盖了 1945—2001 年的 240 次争端。相比于前三种数据, ICOW 更加关注争议问题的本质和类型, 同时突出了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 因此可以更合适检验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假设。除了使用 ICOW 数据之外, 在检验研究假设时, 本文还将使用以下几种数据:

- (1) “战争相关指数” (Correlates of War, COW) 中的“国家综合能力指数” (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 数据;<sup>③</sup>
  - (2) COW 中的“双边贸易” (Bilateral Trade v2.01) 数据;<sup>④</sup>
  - (3) “政体 IV” (Polity IV) 数据;<sup>⑤</sup>
  - (4) COW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Data);<sup>⑥</sup>
  - (5) COW 的“外交交换数据” (Diplomatic Exchange data);<sup>⑦</sup>
  - (6) COW 的“正式同盟数据” (Formal Alliance data)。<sup>⑧</sup>
- 此外, 在数据处理时, 本文充分利用了既有研究中的“复制数据”

---

① 关于这几种冲突调停数据库的介绍及相关应用可参考刘丰、陈冲《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27—30页。

② ICOW 数据可以访问 <http://www.paulhensel.org/icoworg.html> 下载。关于 ICOW 数据的详细介绍可参考 Paul R. Hensel, “Contentious Issues and World Politics: The Management of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Americas, 1816—199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5, No. 1, 2001, pp. 81—109。

③ CINC 数据可以访问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下载。

④ 双边贸易数据可以访问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下载。

⑤ Polity IV 数据可以访问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下载。

⑥ 国际组织成员数据可以访问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下载。

⑦ 外交交换数据可以访问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下载。

⑧ COW 正式同盟数据可以访问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下载。

(replication data), 其中包括“预期效用生成和数据管理项目”(Expected Utility Genera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Program, EUGene)。<sup>①</sup>

## (二) 变量操作化

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测量网络结构和关系的一整套分析工具, 其中结构对等性 (Structural Equivalence) 等将用来测量上述假设中的关键概念。为了测量调停网络的结构和调停者在网络中的位置对调停效果的影响, 本文选择了多种维度的数据进行变量操作化。

###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调停效果”。ICOW 数据对调停效果具有以下操作定义: 没有达成协议 (no agreement), 达成协议 (agreement), 批准协议 (ratification), 遵守协议 (compliance), 结束争端 (end of claim)。本文分别从 0—4 赋值, 因变量的取值反映了调停效果逐渐显著 (或成功) 的趋势 (见表 1)。

表 1 第三方调停的效果 (ICOW, 1945—2000)

	频数	百分比 (%)
没有达成协议	140	58.33
达成协议	16	6.67
批准协议	7	2.92
遵守协议	58	24.17
结束争端	19	7.92
总计	240	100.00

### 2. 自变量

根据前文的讨论, 本文主要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提供的两种分析工

<sup>①</sup> 参见 <http://www.eugenesoftware.org/>。大量使用复制数据已经成为近年来定量研究数据的一个主要来源, 这不仅加快了数据的处理速度, 而且也促进了学术研究“可复制”原则的推广。

具: 中心度 (centrality degree) 和结构对等性。<sup>①</sup> 一个点的度数是该网络中该点与其他点之间联系值之和。<sup>②</sup> 这个变量表明了一个点与另一个点的联系有多少渠道 (access), 度数的测量公式为:

$$d(i) = \sum_{v \neq i} v(i, j)$$

同时本文将考察调停集团成员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全球贸易网络和同盟网络的结构位置。在社会网络分析中, 点 i 和 j 在关系 r 中的结构对等性 (SEq<sub>ij</sub><sup>r</sup>) 测量公式为:

$$SEq_{ij}^r = \frac{\sum_{k=1}^n (x_{ik} - x'_{\cdot i})(x_{jk} - x'_{\cdot j}) + \sum_{k=1}^n (x_{ki} - x'_{\cdot i})(x_{kj} - x'_{\cdot j})}{\sqrt{\sum_{k=1}^n (x_{ik} - x'_{\cdot i})^2 + \sum_{k=1}^n (x_{ki} - x'_{\cdot i})^2} \sqrt{\sum_{k=1}^n (x_{jk} - x'_{\cdot j})^2 + \sum_{k=1}^n (x_{kj} - x'_{\cdot j})^2}}$$

其中,  $x'_{\cdot i}$ ,  $x'_{\cdot j}$  是 i 和 j 组成的社会计量矩阵行平均值,  $x'_{\cdot i}$  和  $x'_{\cdot j}$  是矩阵的列平均值。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测量如下解释变量。

### (1) 多方调停

鉴于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多方调停对国际争端效果的影响, 为了控制效果研究的选择偏见, 首先需要将多方调停的是否发生考虑进来。因此, 本文设计了“多方调停”这一虚拟变量, 当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调停者时, 赋值为“1”, 否则为“0”。如前文所述, 本文的多方调停仅指第三方调停者形成调停集团管理争端的案例, 而排出了另外两种“相继调停”和“同时但不协调调停行动”形式的多个调停者管理冲突情况。<sup>③</sup>

### (2) 调停集团规模

集体行动理论强调了调停集团的规模对其行动效率的影响, 为此本文

① 关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相关概念介绍可参考约翰·斯科特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第2版)》(刘军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一般称与某个特定的点相邻的那些点为该点的“领域”(neighborhood), 领域中的总点数为度数 (degree), 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为“关联度”(degree of connection)。

③ 参考 Crocker, et al., eds., *Herding Cats: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A Complex World*, p. 10.

设计了“调停集团的规模”这一变量测量参与争端调停的国家数量。在 ICOW 数据中，这一变量的取值为 [1, 6]，既存在单个调停的案例，也存在六个国家形成调停集团共同调停的案例。鉴于集体行动理论强调参与调停的国家数量并非越多越好，而权力解释路径则持相反的观点，因此，本文同时计算了对这一变量的平方值，其值域为 [1, 36]。

### （3）国际组织成员数量

既有研究表明，政府国际组织不仅为争端各方提供了交流场所，而且也提供了它们与潜在调停者的联系渠道。在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如果争端方共同参加的国际组织数量越多，那么意味着它们在信息交流上越有效，进而会促进调停的成功。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看，共同加入国际组织形成政府间组织，在争端方与调停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社会网络，网络的结构本身就会影响它们之间信息的传递，进而影响其对外行为。<sup>①</sup>为此，本文计算了争端方当年共同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这一数据来源于 COW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在处理时，本文使用汉·多纳森和休·沃德 2008 年的复制数据。<sup>②</sup>

### （4）信息流动

理性主义将调停的成功归咎于争端方之间有效的信息传递，由于减少了私有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减少了双方的不确定性。<sup>③</sup>在社会网络中，即使争端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网络本身也为争端方提供了间接的途径，即通过第三方联系。在社会网络看来，越短越密集的联系传递的信息越多、越准确。利用汉·多纳森和休·沃德 2008 年的复制数据，本文计算了争端方经由第三方传递的最大信息流动。他们对这一变量的测量公式为：

<sup>①</sup>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5 - 2001*; Böhmelt,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Importance of Indirect Ties," pp. 298 - 319.

<sup>②</sup> Dorussen and War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A Network Perspective," pp. 189 - 212, 数据可以从塞奇 (Sage) 出版公司网站下载。

<sup>③</sup> 参考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for War," pp. 379 - 414; 卢璟、陈冲 《国际调停发生的讨价还价模型：一种定量检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5 期，第 58—81 页。

$$\text{最大信息流动}(i, j) = \min(d(i), d(j))$$

$$\text{其中 } d(i) = \sum_{v \neq i} v(i, j)$$

### (5) 第三方联系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争端方的直接联系在中断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形成的间接联系将代替直接交流渠道。本文计算了争端方在国际组织网络中形成的间接联系总和，其计算公式如下：

$$\text{第三方联系}(i, j) = \ln\left(1 + \sum_{k \neq i, j} v(i, k) v(k, j)\right)$$

其中， $i, j$  为冲突方， $k$  为联系冲突方的第三方， $v$  为连接两个行为体的关系强度。这一变量数据来源于汉·多纳森和休·沃德 2008 年的复制数据。

### (6) 调停者偏见

鉴于偏见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此在具体操作时，本文选择以实力较强一方作为参照标准。为了测量调停者的偏见，本文使用 EUGene 中的“相似性分值”（Similarity Scores，简称 S 分值）。<sup>①</sup>这一分值在安全研究中被广泛用来测量国家的偏好相似性。<sup>②</sup>本文计算了调停者  $k$  分别与争端方  $i, j$  之间的 S 分值之差，作为调停者的绝对偏见值：

$$S - \text{Score}(k, ij) = \sum |S_{ik} - S_{jk}|$$

### (7) 调停者实力

权力聚集效应对多方调停效果的解释强调了调停者数量的增加会增加

---

① Curtis S Signorino and Jeffrey M. Ritter, "Tau - b or Not Tau - b: Measuring the Similarity of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1, 1999, pp. 115 - 144.

② 使用 S 分值测量第三方偏见的研究可参考 Stephen E. Gent, "Strange Bedfellows: The Strategic Dynamics of Major Power Military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pp. 1089 - 1102; Stephen E. Gent and Megan Shann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Adjudication: Getting Into A Bind,"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2, No. 2, 2010, pp. 366 - 380; Stephen E. Gent and Megan Shannon, "Bia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rd-Party Conflict Management Mechanism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8, No. 2, 2011, pp. 124 - 144.

调停集团在积聚资源、分享情报上的总体能力，同时也会分担调停失败的风险，从而使得多方调停比单方调停更容易成功。<sup>①</sup>在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测量国家实力的指标是 COW 数据库的国家综合能力指数。因此，本文利用这一数据，设置了“调停者实力”这一变量，它由多方调停者的实力得分累计相加而得。

#### （8）同盟关系

既有研究突出了争端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军事上的同盟关系将显著影响争端解决的方式，进而倾向于通过谈判和协商的途径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而同盟本身的存在也提供了解决争端的机制。<sup>②</sup>利用“同盟条约义务与供应”数据，本文计算了争端双方是否存在同盟关系，这一数据的观测时段为每五年。

#### （9）外交联系

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争端双方在争端爆发时拥有外交通信渠道交换彼此信息和意图，则有利于危机的管理与和平解决，而外交代表（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可以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本文利用 COW 的“外交交换数据”测量争端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当年是否在另一国派驻外交代表，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其中“1”指至少有一方在另一国派有代表，“0”表示双方均没有在对方国派驻代表。

#### （10）政体类型

利用 Polity IV 数据，测量了争端双方的政体类型。Polity IV 对政体测量的分值为“-10”到“+10”，其中得分在“6 及其以上”的视为“民主国家”。鉴于本文的分析单位是争端双方，因此本文对政体类型的处理

---

① Crocker, et al., “A Crowded Stage: Liabilities and Benefits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 58.

② 关于同盟关系对调停行为的影响研究可参考 J. Michael Greig and Patrick M. Regan, “When Do They Say Yes? An Analysis of the Willingness to Offer and Accept Mediation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4, 2008, pp. 759 - 781; J. Michael Greig, “Stepping Into the Fray: When Do Mediators Medi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2, 2005, pp. 249 - 266; Molly M. Melin and Isak Svensson, “Incentives for Talking: Accepting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5, No. 3, 2009, pp. 249 - 271.

不同于大多数既有研究对双方政体得分的直接相加,相反首先分别对争端双方的政体得分重新赋值,将得分在“6”及其以上的赋值为“1”,表示为“民主国家”;然后当争端双方均为民主国家时,赋值为“1”,否则为“0”。

#### (11) 调停者政体

社会网络分析强调了调停网络的同质性的影响。既有研究认为,国家的政体类型是决定其同质性最显著的指标,因此本文利用 Polity IV 数据,测量了调停者的政体类型,不同于博梅尔特对多方调停者得分数值的简单相加处理方式,本文首先分别重新对各个调停者的得分进行赋值,将得分在“6 及其以上”的赋值为“1”,表示民主国家,否则赋值为“-1”,表示非民主国家;然后,将这些得分相加,理论上这一汇总变量的值域是  $[-6, 6]$ , 其实际值域是  $[-3, 5]$ 。

#### (12) 双边贸易

本文利用 COW 中的“双边贸易”数据,测量争端双方当年的双边贸易额,考虑到贸易数额的偏态分布,本文采用危机双方的双边贸易的自然对数,其公式如下:

$$\text{双边贸易}(i, j) = \ln(1 + \sum v(i, j))$$

其中,  $i, j$  为争端双方,  $v$  表示两个行为体的贸易联系,贸易总额等于双方当年进出口总额之和,为避免两国双边贸易额为“0”时,真数不能取 0 的情况,故在公式中添加“1”。

#### (13) 结构对等性

这一变量直接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它着重分析了行为体调停者在整个国际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的相似性。处于相似位置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更有可能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模式,因此它们在冲突管理中有可能实现更好的交流。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看来,即使网络中的行为体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只要它们在社会网络中具有相似的位置关系,它们的行为模式会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其利益也具有较大的

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有助于它们之间潜在的合作。利用毛兹等 2006 年的复制数据，<sup>①</sup> 本文计算了调停者在国际组织网络、贸易网络和同盟网络中的位置相似性。

#### （14）战略竞争对手

调停者之间的战略关系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合作。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如果调停者互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它们这种关系很可能传递到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根据威廉·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对“战略竞争对手”的界定，<sup>②</sup>本文计算了调停集团成员是否互为战略竞争对手。如果至少两个国家互为战略竞争对手，则赋值为“1”，否则为“0”。这一数据同样来自于毛兹 2006 年的复制数据。<sup>③</sup>

#### （15）非平衡关系

毛兹发现，即使在社会网络中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敌对或同盟关系，国家之间很有可能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朋友的敌人是敌人”等间接关系决定其行为方式。因此，利用毛兹等 2007 年的复制数据，<sup>④</sup>本文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概念检验了调停者之间存在的非平衡关系对调停效果的影响。

### 3. 控制变量

除上述变量外，为了更加全面的检验本文社会网络理论对多方调停效果的解释力，并控制效果研究中存在的选择效应的影响，本文综合了既有研究对调停效果的解释，设计了如下控制变量。

---

① Maoz , et al. , “Structural Equiva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 pp. 664 - 689.

② William R Thompson, “Identifying Rivals and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 45 , No. 4 , December 2001 , pp. 557 - 586.

③ Maoz , et al. , “Structural Equiva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 pp. 664 - 689.

④ Maoz , et al. , “What Is the Enemy of My Enem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816 - 2001 ,” pp. 100 - 115.

(1) 争端持续时间

既有研究表明, 调停者对于长期争端的介入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它们倾向于调停那些持续时间较短的争端, 因此这类争端更容易经历成功的调停, 这就导致效果研究中出现了选择偏见。为了控制这一选择偏见的影响, 本文根据 ICOW 数据中的变量“持续时间”设计了这一变量。

(2) 争端烈度

同样, 对于争端烈度较大的争端, 由于担心调停失败对其声誉等影响, 调停者可能也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为了控制这一变量的影响, 本文根据 ICOW 数据中的“声明影响指数”(Claim Salience Index) 测量的争端激烈指数, 设计了争端烈度这一变量。它在每 0.5 个区间内变动, 在本文选择的时间跨度内, 其值域为 [2.5, 12], 见表 2。

表 2 争端烈度指数

指数	频数	百分比 (%)
2.5	2	0.833
3	12	5.000
3.5	3	1.250
4	12	5.000
5	30	12.500
6	34	14.167
7	42	17.500
8	25	10.417
9	40	16.667
10	30	12.500
11	1	0.417
12	9	3.750
总计	240	100.000

(3) 实力对比

传统的属性研究路径突出了争端双方的实力对比对争端效果的影响。一方面, 如果争端双方的实力相当, 那么这可能意味着双方为了达到各自

的目标所付出的资源和代价也大致相当,从而很容易造成一种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接受妥协的可能性增大,有利于调停的成功;另一方面,如果双方实力悬殊,那么强大的一方可能不愿意接受过多的让步和妥协,对第三方调停并不情愿,在这种情况下,调停就不容易成功。本文使用COW的“国家综合能力指数”来测量双方的权力平衡关系。

#### (4) 争端类型

ICOW数据记录了领土、河流和海洋权益类型的争端。一般而言,由于领土具有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其在所有类型的争端中是最难以调停的。<sup>①</sup>鉴于调停者有可能倾向于选择不同类型争端进行调停。为了控制不同类型争端的影响,本文分别将领土、河流和海洋争端分别赋值为“1”、“2”、“3”。

表3 变量设置概览

变量名	变量定义及数据
因变量	
调停效果	没有达成协议=0;达成协议=1;批准协议=2;遵守协议=3;结束争端=4;数据来源于ICOW
自变量	
多方调停	争端是否经历多方调停,是为1,否则为0,数据来源于ICOW
调停集团规模	组成调停集团的第三方调停者数量,值域为[1,6],数据来源于ICOW
IGO成员数量	争端方共同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形成的数量,数据来源于Dorussen,Han(2008)
信息流动	根据调停者在政府间国际组织形成的网络测量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贸易和信息流动,数据来源于Dorussen,Han(2008)
第三方联系	争端方通过第三方形成的间接联系,数据来源于Dorussen,Han(2008)
调停者偏见	调停集团成员对争端双方的偏见程度,数据来源于EUGene
调停者实力	根据CINC计算所有调停者的实力总和,数据来源于COW
同盟关系	争端双方是否存在同盟关系,数据来源于Maoz,et al.(2007)
外交联系	争端双方是否存在大使级或部长级的外交关系,数据来源于COW
政体类型	争端双方均是民主政体时赋值为1,否则为0,数据来源于Polity IV

<sup>①</sup> 关于议题不可分割性对讨价还价影响的详细论述可参考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 for War,” pp. 379-414。

续表

变量名	变量定义及数据
调停者政体	汇总变量,调停者为民主政体是赋值为 1,否则为 -1,加总,值域[-3,5]
双边贸易	争端双方前一年的双边贸易总量,数据来源于 COW
结构对等性	根据 SNA 测量调停者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贸易网络和同盟网络中所处位置的相似性,数据来源于 Maoz, et al. (2006)
战略竞争对手	争端双方是否属于战略竞争对手,数据来源于 Maoz, et al. (2006)
非平衡关系	根据在网络中的位置,“敌人的敌人”,“朋友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并计算其非平衡关系,数据来源于 Maoz, et al. (2007)
控制变量	
争端持续时间	争端持续的时间,数据来源于 COW
争端烈度	争端的激烈程度,数据来源于 ICOW
实力对比	争端方之间的实力对比,数据来源于 COW
争端类型	领土、河流和海洋权益争端,数据来源于 ICOW
调停历史	在本次争端调停之前的五年是否经过成功的调停(是 = 1,否 = 0)

### (5) 调停历史

一些研究表明,如果先前的冲突经历了成功的调停,那么当二者再次发生冲突时,双方将“以史为鉴”,更愿意通过调停,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sup>①</sup>同时,对调停者而言,鉴于历史上有过成功调停的经历,它们也更愿意参与这类型的调停,从而可能存在选择效应。因此本文利用 ICOW 数据中“过去五年中成功的和平努力次数”设计了这一控制变量,这一数值型变量的值域为 [0, 7]。

### (三) 统计模型

鉴于本文旨在探究多方调停如何影响国际争端管理的效果这一问题,本文主要使用推论统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研究假设。由于对调停效

<sup>①</sup> 关于先前冲突历史对调停影响的研究可参考 Beardsley, “Pain, Pressure and Political Cover: Explaining Mediation Incidence,” pp. 1 - 12; Greig and Diehl, “Softening Up: Making Conflicts More Amenable to Diplomacy,” pp. 355 - 84; Greig, “Stepping Into the Fray: When Do Mediators Mediate?” pp. 249 - 266; Melin and Svensson, “Incentives for Talking: Accepting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 pp. 249 - 271。

果这一因变量为定序变量, 因此本文将使用“次序 Probit 回归模型”检验影响调停效度的因素; 同时为了控制样本选择误差的影响, 将使用赫克曼选择模型。

$\Pr(y_i \leq j)$  对于常规 Probit 模型, 因变量是二分的:  $y = 0, 1$ 。尽管结果有两种可能性, 但是仅对  $\Pr(y = 1)$  或  $\Pr(y = 0)$  感兴趣, 因为  $\Pr(y = 0) = 1 - \Pr(y = 1)$ 。由于模型中包含连续型解释变量, 需要利用累积概率将常规的二项 Probit 模型扩展至次序 Probit 模型: 假设响应变量  $y_i$  的取值为  $1, 2, \dots, J$  ( $J \leq 3$ ), 这些取值分别与排好了次序的响应类别相对应, 那么一个一般性的概率模型可以写成累积概率的形式。累积概率表示的是小于或等于某一特定值  $j$  的概率。个体  $i$  出现响应水平  $j$  的累积概率记为  $C_{ij}$ , 可以写成:

$$C_{ij} = \Pr(y_i \leq j) = \sum_{k=1}^j \Pr(y_i = k) \quad j = 1 \dots J$$

根据定义, 当  $j = 1$  时, 累积概率必定等于 1, 这意味着对于所有的个体  $i$  而言,  $C_{ij} = 1$ 。这一约束条件限定了只有  $J - 1$  个累积概率才是唯一可识别的。我们将累积概率表示成某一组自变量所构成向量  $X_i$  的函数, 通过设定以下条件累积概率, 我们就得到了次序 Probit 模型:

$$C_{ij} = \Pr(y_i \leq j | x_i) = \Phi(\alpha_i + x_i' \beta)$$

这里,  $\Phi(\cdot)$  表示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本文使用到的另一个重要模型是“样本选择模型”。这一模型可以简单地表示为两个方程:

1)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也称结果模型):

$$y_i = x_i \beta + \varepsilon_i, \text{ 当且仅当 } W_i = 1 \text{ 时, 可以被观测到}$$

2) 选择方程 (Selection equation):

$$w_i^* = z_i + \mu_i w_j = 1, \text{ 如果 } w_i^* > 0, \text{ 否则 } w_i = 0$$

$$Pr(w_i = 1/z_i) = \varphi(z_i\gamma) \ \&Pr(w_i/z_i) = 1 - \varphi(z_i\gamma)$$

其中  $x_i$  是决定结果变量  $y_i$  的内生变量 ( exogenous variables) 的一个向量,  $w^* i$  是一个潜在内生变量; 如果  $w^* i$  比阈值 ( threshold) ( 比如 0) 大, 那么被观测的虚拟变量  $w_i = 1$ , 否则  $w_i = 0$ ; 回归方程只能观测  $w_i = 1$  的值;  $z_i$  是决定选择过程结果变量  $w^* i$  的内生变量的一个向量,  $\Phi$  是标准的正态分布函数;  $\varepsilon_i$  和  $\mu_i$  是两个回归方程的误差项。

更具体地, 为了控制不同因素对因变量的效果, 本文在检验假设中将使用“嵌套模型”这一策略, 本文一共设计八个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 其中基准模型只包含了控制变量, 在此基础上, 本文逐渐增加至全模型。<sup>①</sup>

$$P_i = \beta_0 + \beta_1\chi_1 + \beta_2\chi_2 + \dots + \beta_k\chi_k + \varepsilon_i = \sum_{k=0}^K \beta_k\chi_{ik} + \varepsilon_i$$

本文使用 STATA MP11.0 进行数据分析。接下来, 将报告和讨论本文数据分析的结果。

#### 四、统计分析结果

在开始回归分析之前, 为了避免回归方程中变量共线性对结果造成的偏误, 本文首先对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sup>②</sup> 模型 I 和模型 II ( 见表 4) 使用次序 Probit 回归方法检验了传统路径对多方调停效果的解释, 在随后的模型 III - VIII 中 ( 见表 5 至表 7), 本文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 并同时使用了次序 Probit 回归方法和赫克曼选择模型两种方法, 以控制调停效果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选择偏误的影响。接下来将详细讨

---

① 这种建模思路的好处在于可以清晰比较不同变量的解释力度, 参考 Maoz, et al., “Structural Equiva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pp. 678 - 679。

② 鉴于篇幅限制,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可访问作者的个人主页 ( <http://chong.yolasite.com/research.php> ) 查看。

论本文的研究发现。

在模型 I 中, 本文发现控制变量中只有“争端方的实力对比”变量通过了 99% 的水平显著性检验, 而且回归系数为负数。这表明, 当争端双方的实力差距越大时, 实力强大的一方对于通过和平方式结束争端的意愿会明显减小, 这一发现与博梅尔特的研究相似。<sup>①</sup>而且, 在后面的三个赫克曼模型中, 本文进一步发现这一变量对于多方调停的效果与多方调停的发生具有不同的影响: 争端方之间的权力差距越大, 多方调停越容易发生; 但这种权力差异并不会显著地帮助调停达成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相反在权力差异较大的争端调停中, 实力强大的一方对于进一步的协议会比较勉强。换言之, 一旦调停开始, 实力相当的争端方更容易达成更进一步协议。这一发现也支持了比尔兹利的“迂回目标”(Devious Objectives) 对调停发生和效果的解释机制。<sup>②</sup>在实力悬殊的争端中, 实力强大的一方或由于国际国内的观众成本压力或其他原因勉强接受第三方提供的调停, 但一旦调停开始, 这种压力就会转移, 因此对于实力强大而本来并非真心接受调停的这一方来说, 其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合作和妥协程度会降低, 进而不容易达成更有效的协议或者彻底结束争端。出乎意料的是, 变量“多方调停”虽然显示出它对解决争端具有积极的影响, 但它并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需要注意的是, 这并非表明多方调停是一种无效行为。事实上, 正如接下来的“调停集团规模”变量所表明, 多方调停确实对争端的解决具有影响。不过, 鉴于这一非显著性统计结果, 本文还是谨慎地认为, 对待多方调停要避免过度的乐观, 它并不一定对争端的解决有效, 它的积极效用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在模型 II 中, 本文加入了供给方变量和需求方变量。本文发现, 对于多方调停而言, 调停集团的规模和调停者偏见对多方调停的效果

---

① Böhmelt, “Disaggregating Mediations: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 873.

② Beardsley, *Politics by Means Other than Wa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 47.

具有显著的影响。首先, 本文的发现部分支持了集体行动理论对调停效果的解释, 即调停集团的规模并非越大, 效果越显著。变量“调停集团规模”和“调停集团规模的平方”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差异和边际概率变化表明, 集团规模过小或过大均不利于多方调停达成有效结果。这一发现与博梅尔特的研究结果相似, 即调停集团的规模与调停的效果之间存在一个“倒 U 型”的关系。<sup>①</sup>这一发现具有比较明显的政策意义, 它提醒争端方在请求调停者干预时需要注意集团的规模, 否则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其次, 主要调停者对争端一方存在的偏见会显著影响多方调停的效果。从变量“调停者偏见”的回归系数和边际概率变化可知, 主要调停者如果过多偏向争端的其中一方, 那么多方调停很难达成最有效的结果, 即彻底结束争端。这一发现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6。

在表 4 中, 本文的其他解释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一方面可能说明传统的解释变量和分析路径对于多方调停效果的解释并不理想(正如前文文献回顾中所指出的一样), 而在本文随后的社会网络分析解释框架下, 本文发现了更多先前被忽视的影响多方调停效果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模型 II 中的缺失数据的影响。由于变量“政体类型”缺失数据过多, 致使整个模型的有效观测案例只有 161 个, 大大减少了模型的拟合度。<sup>②</sup>不过, 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 不同于博梅尔特将缺失数据重新赋值为“0”的处理方法, 本文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选择偏误的影响, 依然保留了原始数据记录, 这样尽管减少了有效观测的样本数量, 但避免了研究者的“自我选择偏误”(self-selection bias)对统计结果的影响。<sup>③</sup>

---

① Böhmelt, “Disaggregating Mediations: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pp. 859 – 881.

② 为此, 当把“政体类型”移除回归模型时, 整个模型的解释力度显著加大了。但本文这里并没有报告这一统计结果, 因为这很容易陷入研究者的“自我选择偏误”中。

③ 参考 Fearon, “Selection Effects and Deterrence,” pp. 5 – 30; Reed, “Selection Effects and World Politics Research,” pp. 1 – 4.

表 4 多方调停效果的次序 Probit 回归分析

	模型 I			模型 II		
	回归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	回归结果	标准误	边际效应 (%)
多方调停	0.0934342	0.1940586	3.64342	1.023737*	0.5353606	39.89494
集团规模平方				-0.2129926**	0.0899532	-8.3003
集团规模平方	-0.0011246	0.0015295	-0.04378	-0.0019508	0.0021246	-0.07602
持续时间	0.0103054	0.0383722	0.40116	-0.0544339	0.0618797	-2.12128
争端烈度	0.0846346	0.0640776	3.29457	0.0131484	0.1057593	0.51239
调停历史	-0.7725617***	0.2571438	-30.07353%	0.1081011	0.5110545	4.21269
实力对比	0.0385694	0.1101404	1.50139	0.0339201	0.1641326	1.32186
争端类型				-1.974837	1.675549	-76.95921
调停者实力				0.2153521	0.725204	8.40591
同盟关系				0.4000197	0.2692436	15.2621
外交联系				0.6108259	1.142636	23.8038
IGO 位置 1				-0.6005496	1.019568	-23.40336
同盟位置 1				0.3688048	0.6626347	14.3723
贸易位置 1				0.5440267	0.3576515	21.4388
政体类型				0.1484458	0.1212921	5.78492
调停者政体				-0.5777809***	0.2117412	-22.51607
调停者偏见				0.0000129	0.0000765	0.0005
双边贸易				-0.4528376	1.002481	
Cut1	-0.0129605	0.3888805		-0.2412058	0.9995104	
Cut2	0.1685002	0.3891294		-0.097873	0.9935764	
Cut3	0.2560317	0.3877658				
N		229			161	
Log likelihood		-255.57754			-165.53254	
Pseudo R2		0.0294			0.0952	
Wald $\chi^2$		16.68			42.17	

注: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

表 5 网络变量与多方调停效果的回归分析 ( I )

	模型 III			模型 IV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边际效应 (%)	结果模型	选择模型	
IGO 数量	0.0167386 *	0.0098642	0.61208	0.049193	0.0353487	
战略竞争	0.4937059 **	0.2408983	17.9687	-0.1804996	0.7197114	
敌人的敌人	-0.3581899	0.3208693	-12.17849	-0.1331461	0.9089697	
盟友的敌人	-0.4493024 *	0.2656874	-16.097	0.1779839	0.7102886	
敌人的盟友	0.0930673	0.2676872	3.41689	0.8079641	0.7096951	
非平衡关系	-0.3164906	0.2273474	-11.57313	0.1730455	0.7492037	
贸易位置 3	-0.4170806	0.3739741	-15.25142	-0.1723935	0.9545923	
同盟位置 3	-0.5315222	0.3450693	-19.43621	-0.8713196	1.218855	
IGO 位置 3	10.66098 **	5.263416	389.841	-0.1798476	1.376876	
调停者偏见				-0.0234245	0.4692106	-0.6171321 **
双边贸易	-0.0000619	0.002141	-0.00226	-0.00016	0.0002073	0.0000969
持续时间	-0.1063843 **	0.0480232	-3.89016		0.0028901	0.0019758
争端烈度	-0.0376651	0.1053592	-1.3773		0.1245348 **	0.049182
调停历史	-0.751973 *	0.3897169	-27.49745		-0.2292348 **	0.1150826
实力对比	0.0793229	0.1598184	2.90061		1.48556 ***	0.3683623
争端类型					0.3743946 **	0.1667972
常数					-3.01929 ***	0.4868462
Cut1	9.975912	4.716357				
Cut2	10.19074	4.72171				
Cut3	10.2941	4.724662				
N (Censored)	191			201		(129)
Log likelihood	-186.31406			-215.8806		
Pseudo R2	0.0826			Rho = -.0700157		
Wald $\chi^2$	32.24			13.85		0.05
Prob > chi2	0.0037			0.2415		0.8272

注: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

在随后的模型 III - VIII 中, 本文着重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检验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在这一部分, 本文在每一个次序 Probit 回归模型之后, 又进行了赫克曼选择模型回归分析, 以控制选择偏见的影响。并且, 三个次序 Probit 回归模型以及三个赫克曼选择模型的主要差别在于本文的三个核心网络变量。鉴于这三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较高, 因此本文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从表 5、表 6 和表 7 的统计结果中, 本文有如下发现。

首先, 由共同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形成的网络对多方调停的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为争端方提供了间接的联系, 这种间接联系将多方调停者联系在一起, 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和交流, 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争端双方缺乏的直接联系; 另一方面争端方和多方调停者在这一网络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行为偏好, 那些具有结构相似性的行为体表现出共同利益和行为偏好, 因此社会网络的这一特性直接影响了多方调停者与争端方之间的互动。<sup>①</sup>在模型 III 中, 用以测量争端方拥有的联系的变量“共同的国际组织成员”虽然只通过了 90% 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但同时用以测量争端方的利益相似性的结构对等性变量“政府间国际组织位置”也通过了 95% 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这两个变量表明了国际组织成员对多方调停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sup>②</sup>

其次, 本文发现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的信息流动相比于传统的联系理论解释力更强。传统的调停研究注意到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流动如外交联系、贸易联系等可以减少彼此之间的不确定性, 进而有助于争端的和平解决。但大多数研究测量的都是双方之间的直接联系, 忽视了即使在没有直接联系的冲突双方之间, 信息依然可以通过第三方传递。

---

① 类似的发现可参考 Maoz, et al., “Structural Equiva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pp. 664 - 689.

② Dorussen and War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A Network Perspective,” pp. 189 - 212.

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关于联系机制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太强的经验证据支持(见模型 I 和模型 II)。<sup>①</sup>在模型 VI 中,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的“信息流动”变量通过了 95% 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通过社会网络可以测量到“看不见”的信息流动,而这些“看不见”的信息传递正是通过网络中的第三方联系完成的。在随后的模型 VIII 中,本文的这一结论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变量“第三方联系”对多方调停同样具有显著的影响,争端双方拥有的第三方联系越多,就越有可能彻底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这是因为,一方面拥有的第三方联系越多,表明其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深,这不仅为争端双方之间的间接交流提供了场所和渠道,也使得争端方之间可以更有效的交流;另一方面,这些第三方联系将争端方与国际社会的其他行为体广泛联系在一起,使得争端本身的负外部性更容易“外溢”到第三方,当负外部性越大时,参与调停的多方行为“搭便车”的意愿会大大减低,因为这些负外部性也直接影响到调停者本身的利益。因此在此意义上,通过网络变量测量的第三方联系和信息流动可以很好地补充集体行动理论对于多方调停效果解释的缺陷——即忽视了负外部性的强弱对“搭便车”行为的抵消作用。<sup>②</sup>

再次,本文发现调停集团成员之间的结构位置对争端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尽管在六个变量中只有“盟友的敌人”和“IGO 位置”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调停集团中,即使调停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敌对关系,但其中一方是其盟友的敌人,那么这种间接关系也会对它们在调停过程中的合作产生负面的影响,不利于争端的解决。同时,它们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中的相似位置表明它们具有相似的利益,

---

① 相关研究可参考 Böhmelt,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Importance of Indirect Ties,” pp. 298 - 319; Tobias Böhmelt,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p. 566 - 592。

② 参考 Beardsley, *Politics by Means Other than Wa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hapter 3; Beardsley and Greig, “Disaggregating the Incentives of Conflict Management: An Introduction,” pp. 243 - 248。

这将促进它们在调停过程中的合作，导致其显著地增加争端解决的效果（389%）。这一发现补充了博梅尔特对调停集团成员冲突与合作关系的测量，发现了更为“隐含”但却重要的影响调停集团成员互动的因素，同时也展示了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新颖路径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前景。

最后，通过三个赫克曼样本选择模型，本文发现多方调停效果的研究中也存在“选择效应”，这一选择效应来源于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结果，即莫丽·美林所说的“进入效应”（entry effects）。<sup>①</sup>本文的控制变量（争端持续时间、争端烈度、调停历史、实力对比和争端类型）在选择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假设检验。换言之，它们对多方调停者是否决定参与调停具有显著的影响，调停者会根据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行考虑决定是否提供调停。例如，调停者会倾向于选择那些争端烈度大、争端双方实力悬殊的争端进行调停，这样就产生了选择偏见。可以说，在整个调停的第一阶段，调停者的这种选择偏见已经导致了多方调停效果研究结果存在的偏误结果。这一发现提醒我们在关注调停效果的同时，首先也要关注影响调停发生的那些因素，因为那些因素很可能会影响调停者是否选择调停，而这会进一步导致结果研究出现偏误。

总之，通过本文的这八个回归模型，本文比较系统地检验了影响多方调停效果的一系列因素。从表8的统计结果总结中可以发现，传统的分析路径并不能完全解释多方调停效果，相反，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本文比较有力地补充了既有解释的不足，并发现了影响多方调停效果的新因素。同时，本文也发现，在多方调停效果研究中，如果不将影响其发生的因素控制，那么很可能出现选择偏见，进而导致多方调停效果研究出现偏误。

---

<sup>①</sup> 它来源于行为体是否作为第三方冲突管理者参与调停的决定，因为第三方在决定是否卷入争端时会进行战略计算，参考 Molly M. Melin, et al., “It Takes Two to Fight but Three to Mediate: Analyzing the Occurrence of Third Party Conflict Management,” p. 6.

表 6 网络变量与多方调停效果的回归分析 (II)

	模型 V			模型 VI		
	回归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	结果模型	选择模型	
信息流动	0.0039566	0.0104409	0.15008	0.0656656 **	0.026175	
战略竞争	0.5105475 *	0.2720851	19.3185	-0.607269	0.7634976	
敌人的敌人	-0.3278181	0.3168205	-11.80376	0.0797313	0.8493659	
盟友的敌人	-0.5070023 **	0.2572793	-18.91889	0.4641066	0.7316489	
敌人的盟友	0.0579254	0.2612909	2.20047	1.234796	0.7605766	
非平衡关系	-0.3266393	0.2243494	-12.39037	0.3905742	0.7122183	
贸易位置 3	-0.3912802	0.4454106	-14.84238	1.051579	1.023338	
同盟位置 3	-0.3560195	0.3754755	-13.50484	-0.6143155	1.336618	
IGO 位置 3	9.801333	8.532106	371.793	-0.8286943	1.361823	
调停者偏见				-0.119121	0.4420113	-0.6181587 **
双边贸易	-0.0008405	0.002119	-0.03188	-0.000149	0.0001103	0.2476371
持续时间	-0.081856 *	0.0465704	-3.10503			0.0000962
争端烈度	-0.0132361	0.1048742	-0.50208			0.0019802
调停历史	-0.720224	0.5316574	-27.32016			0.049093
实力对比	0.0851734	0.1663688	3.23087			0.1169866
争端类型						0.3581159
常数						0.155172
Cut1	8.919124	7.798789				-3.029103 ***
Cut2	9.133602	7.80294				
Cut3	9.236698	7.80501				
N (Censored)		179			201	129
Log likelihood		-186.04703			-213.1865	
Pseudo R2		0.0524			Rho = -.138006	
Wald $\chi^2$		19.88			24.64	0.46
Prob > chi2		0.1341			0.0103	0.4979

注: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

表7 网络变量与多方调停效果的回归分析 (III)

	模型Ⅶ			模型Ⅷ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边际效应(%)	结果模型	选择模型	
第三方联系	0.1106542	0.1764179	4.15377	1.034257**	0.4671246	
战略竞争	0.4598301*	0.249733	17.229	-0.1341443	0.7178858	
敌人的敌人	-0.3460511	0.3199161	-12.23088	0.0348811	0.884864	
盟友的敌人	-0.5091816**	0.2557517	-18.7489	0.0195401	0.6494769	
敌人的盟友	0.06367	0.2659681	2.39486	1.253076	0.7827957	
非平衡关系	-0.3369148	0.224539	-12.64721	0.2281046	0.7037751	
贸易位置3	-0.3412884	0.4085482	-12.81138	0.6334029	0.8952468	
同盟位置3	-0.4557251	0.3579895	-17.10714	-0.4699048	1.382805	
IGO位置3	12.01068*	6.173083	450.86	-10.87527**	5.533476	
调停者偏见				-0.1604286	0.4178506	-0.6170376**
双边贸易				-0.0000667	0.0001004	0.0000964
持续时间	-0.0004197	0.0021155	-0.01575			0.0019732
争端烈度	-0.0882544*	0.0467143	-3.31292			0.1246847**
调停历史	-0.0111201	0.1040035	-0.41743			-0.2309571**
实力对比	-0.7380866	0.4565308	-27.70651			0.48344***
争端类型	0.0858961	0.1634609	-0.22439			0.3744635**
常数						-3.018559***
Cut1	12.12649	5.622886				
Cut2	12.3396	5.629038				
Cut3	12.44185	5.631064				
N(Censored)		184				129
Log likelihood		-187.28919				
Pseudo R2		0.0624				
Wald $\chi^2$		21.32				
Prob > chi2		0.0938				
						0.16
						0.6933

注: \* p<0.10; \*\* p<0.05; \*\*\* p<0.01 (双尾检验)。

表 8 多方调停效果的假设验证总结

研究假设	变量名称	数据是否证实
假设 1: 在国际网络中,争端方通过第三方形成的间接联系越多,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第三方联系	是
假设 2: 在国际网络中,争端方通过第三方传递的信息越多,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信息流动	是
假设 3: 在国际网络中,调停国家的结构位置越相似,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结构对等性_贸易 结构对等性_同盟 结构对等性_IGO	否 否 是
假设 4: 在国际网络中,调停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越少,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敌人的敌人 盟友的敌人 敌人的盟友	否 是 否
假设 5: 调停网络的同质性越高,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调停者政体	否
假设 6: 国际争端中,调停者对实力强大一方的偏见越大,多方调停越容易成功。	调停者偏见	是
假设 7: 在国际争端中,多方调停比单方调停更容易成功。	多方调停 调停者规模	否 是
假设 8: 在国际争端中,调停集团的规模越大,权力越大,调停越容易成功。	调停者实力 调停者规模	否 是
假设 9: 在国际争端中,争端方之间的直接联系越多,调停越容易成功。	双边贸易 外交联系 IGO 成员数量	否 否 是

## 五、结论

本文在对国际争端中的多方调停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分解了多个调停者组成的调停集团内部的互动,提出了重新解释多方调停效果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国际关系中的 ICOW 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统计结果基本上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因而为多方调停效果的解释提供了一些新颖的视角。结论部分将总结本文研究的贡献,讨论存在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就本文的研究贡献而言，首先，鉴于既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多方调停与单方调停的区别，对多方调停效果的解释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单方调停的逻辑推论上，并没有很好的经验检验，本文通过定量研究方法，一方面比较系统地检验了既有研究对多方调停的假设和逻辑，另一方面也检验了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提出的解释多方调停效果的假设。通过 ICOW 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发现，既有对多方调停效果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得到统计数据的显著性支持，这表明单方调停与多方调停确实存在不同的内在逻辑，对于多方调停效果的解释不能完全遵照单方调停的解释机制。

其次，本文从社会网络分析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视角出发，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方法上引入了这一新路径对多方调停效果进行解释。本文着重关注了社会网络通过第三方行为体在争端方之间所形成的间接联系以及调停集团网络之间的间接联系对调停效果的影响。通过对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的回归分析发现，间接联系对多方调停效果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间接联系补充了争端方缺乏直接交流的途径和渠道，有助于争端方之间的信息传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间接联系将（潜在）第三方也纳入争端网络中，这样争端的负外部性通过社会网络外溢到第三方调停者，从而增加了其参与多方调停的意愿。相比于既有研究，本文的一个突出发现是，在调停集团中即使调停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敌对关系，通过社会网络形成的不平衡关系依然会影响彼此对待对方的行为，即如果对方是其盟友的敌人，那么它们会倾向于表现出不合作的行为，从而影响争端的解决效果。同时，如果它们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具有相似的结构位置，即使它们的直接联系比较缺乏，它们会倾向于表现出相似的行为，从而有助于它们在调停过程中的合作。这两点发现正是由于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得出的，从而也表明这种路径对解释国际关系现象中具有的新颖解释力。<sup>①</sup>

---

<sup>①</sup> 对于社会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前景的介绍可参考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5 - 2001*, chapter 12; Maoz, "How Network Analysis Can Inform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47 - 256.

最后, 鉴于既有调停研究中存在的“选择效应”, 本文在数据分析中同时使用了次序 Probit 回归模型和赫克曼选择模型, 通过这两种模型的比较分析, 本文确实发现了多方调停效果研究中容易导出出现调停者的“进入效应”这一偏见。因此, 本文呼吁在案例(样本)选择时需要特别注意这一选择效应, 否则很容易导致结果出现偏误。

当然,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一,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缺失数据的影响。<sup>①</sup> 尽管 1945—2000 年 ICOW 中的争端案例具有 240 次, 但由于不能保证每一个解释变量都得到相应的数据, 因此实际的分析样本远远小于这一数字。这样的样本损失对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尽管本文曾尝试使用“全球领导人和组织行为效果”数据 (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 GLOBE) 和“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 (1946—2008)”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UNGAS) 数据来测量调停者网络的同质性, 但由于缺失数据太多无法进行统计分析。<sup>②</sup> 因此, 对于下一步研究来说, 如何找到在信度和效度上均比较满意的替代数据将非常重要。其二, 在国际调停的实践中, 参与多方调停的主体并不仅限于国家, 近年来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国际争端管理, 而本文并没有关注这类行为体参与的多方调停, 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国际组织相关的一系列数据的缺乏,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如何将国家和国际组织纳入同一网络仍有待进一步地探究。本文相信, 对这些不足的进一步探讨将促进我们对多方调停的深入理解。

---

① 事实上, 缺失数据是困扰所有定量研究 (甚至社会科学研究) 的重要问题, 系统性的数据缺失会严重影响统计效果的解释效力, 关于社会科学中缺失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可以参考 Roderick J. A. Little and Donald B. Rubin,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Missing Data*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7); Adam Davey and Jyoti Savla,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with Missing Data: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② 使用这两种数据库作为同质性 (异质性) 测量数据的研究可参考 Inman, et al., “Cultur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Mediation of Interstate Crises”; Aydin and Regan, “Networks of Third-Party Interven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pp. 573–597。

## 作者简介

刁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1年、2007年和2010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分别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2012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电子信箱: diaodaming@gmail.com

陈冲 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10年和2012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gmail.com

王广涛 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在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wangguang33@163.com

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2010年在兰州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lzdxyys@ yahoo.cn

陈一一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2012年7月在兰州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cyyor@126.com

张锋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电子信箱: fengzhangmc@gmail.com